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高台凝诗意 古都蕴文脉

本报记者 史自强



▼观众在邺城博物馆参观。
邺城博物馆外景。

郝群英摄（人民图片）
宋龙雨摄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让铜雀台的故事流传千载。而这大名鼎鼎的铜雀台，就修建于古邺城内。

走进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的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历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邺城曾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的都城，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之一。

自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进驻邺城以来，40余年的接续考古，逐渐揭开了邺城的神秘面纱。1988年，邺城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之典范”

铜雀台是邺城“三台”之一，另外两台是金凤台和冰井台，这三台依托西城墙夯土修筑起来，是邺城的制高点。《水经注》记载：“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

站在三台遗址的夯土高台上放眼望去，广袤的冀南平原一望无际。三台与古漳河相邻。千百年来，漳河数次改道冲刷，邺城多数建筑早已湮没于泥沙。三台之中，因有藏冰之井而得名的冰井台，已被全部冲毁；铜雀台地表仅存东南一角，高约5米；保存最完好的是金凤台，地表现存台高12米，南北长120米，东西宽71米。

数十年系统考古，完整勾勒出邺城的城市轮廓，“邺城规划”这一影响后世千年的都城制度，也随之呈现在世人面前。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范围约30平方公里，其中邺城遗址的主体范围面积近14平方公里，分为邺北城和邺南城，两城毗连而建、南北衔接，北城的南墙即为南城的北墙，大体呈“日”字形结构。

走进位于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邺城博物馆，展墙上的平面图清晰展示了邺城的整体格局。

邺北城东西2.4—2.62公里，南北1.7公里。正南城东门中阳门、中阳门内大道、正南宫城门、宫城中最主要的宫殿文昌殿共同构成全城的南北中轴线。都城城门、主要道路等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对称分布。一条东西向大道将城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主要是平民居住区，单一宫城坐落于北区中央。宫城东为官署及王公贵族所居戚里，西为皇家园林。”邺城博物馆馆长申鹏介绍。

“曹魏建造的邺北城，是中古时期中国第一座明确实行单一宫城制度的都城，采取先规划、后建设的模式，具有中轴对称的城市格局和明确的功能分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邺城考古队队长沈丽华说。

公元6世纪，东魏、北齐接续营建邺南城。邺南城东西2.8公里，南北3.46公里，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贯穿全城。

“中轴线以南大门朱明门为核心节点，向北依次穿过宫城正门、太极殿、昭阳殿等。城门、道路、主要建筑群等呈中轴对称布局，秩序井然。”申鹏说。

考古学家们提出“邺城规划”概念，高度概括了邺城的历史价值：从曹魏邺城发端，经北魏洛阳城传承，再由东魏北齐邺城完善定型，这种单一宫城居北、中轴对称、功能分区明确的都城范式，直接被隋唐长安城、洛阳城所继承，并辐射影响了古代朝鲜、日本等都城建设。邺城因此被中国古都学会称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之典范”。

不同于那些被现代城市覆压的古都遗址，邺城完整保留在乡村田野之下，受后世城市建设影响较小，夯土城墙、道路、宫殿、水系等遗迹保存相对完整，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演进的珍贵实物标本。

40余年考古工作，不仅厘清了邺城的整体框架，也发掘了佛寺、窑址、墓葬等遗存，出土了大



批珍贵文物，还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都城的社会图景。

邺城博物馆里陈列着铜雀台遗址出土的青石螭首，通长192厘米，螭首微上昂，大口张开，牙齿毕露，口内残存红彩，造型夸张华丽。这是高台建筑台基顶部、围栏下部拐角处的构件，兼具装饰和力学平衡作用，令人遥想铜雀台的巍峨壮丽。

建安风骨与北朝文明的交响

邺城是文化繁荣、宗教兴盛与民族交融之地，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邺城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把邺城作为魏国王都，确立“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政策。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领袖，“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骨干的邺下文人集团汇聚于此。

走进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铜雀三台遗址公园，开阔的魏武广场上，曹操雕像巍然伫立。金凤台台顶的“建安风骨”展厅内，建安七子塑像栩栩如生，展板上展示了三曹与七子的诗文章章。台前的碑廊里，石碑上镌刻着历代文人凭吊三台的吟咏。

“邺下文人频频登临铜雀台吟诗作赋，繁荣了建安文学，铸就了建安风骨。”铜雀三台遗址公园负责人岳金龙说。

遗址公园关联的建安文学馆，以文献、展板、复原场景等，展现邺下文坛的璀璨成就。“馆内设三曹厅、七子厅、其他邺下文人厅、建安文学研究厅等。展厅间长廊相接，碑林相连，庄严大气。”建安文学馆馆长蔡素梅说。

邺城也是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中心。东魏、北齐崇信佛法，邺城之内佛寺林立，高僧云集，佛教造像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准。

“2012年，邺城遗址范围内的临漳县习文镇北吴庄村发现一处大型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各类造像2895件（块），还有约3000块造像碎片，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和隋唐，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邺城考古博物馆馆长安丽娟说。

邺城考古博物馆集中展示了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石刻文物。从北魏“秀骨清像”，到北齐“曹衣出水”，生动反映了北朝佛教造像艺术演变脉络。独具邺城特色的“龙树背龕式”造像最为引人注目。两株交互缠绕的透雕菩提树为背屏；主尊为北齐新样式佛像，面容圆润，双目微闭，肉髻扁平，袈裟轻薄贴体；周围搭配龙、塔、飞天、璎珞等装饰，层层叠叠，繁复精巧。这是邺城地区北朝晚期造像的典型样式，并对北方其他地区造像产生了一定影响。

邺城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曾是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是民族大融合的中心，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碰撞。

邺城遗址出土的东魏—北齐射猎图石函是国家一级文物，材质为豹斑玉，由中空石函和底板两部分组成。石函正立面呈长方形，高浮雕射猎图案和树木，人物相貌、狩猎题材带有浓郁的粟特（中亚）文化风格，是研究粟特人在中原活动的重要实物资料，体现了中原与中亚的文化交融。

邺城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齐白石覆钵塔，形制源自古印度，雕刻有中原的龙纹、鲜卑审美特征的人物面容，残存贴金彩绘。印度式佛塔与中国本土楼阁式建筑融为一体，反映了丝绸之路艺术互鉴。

大遗址保护让古都“活”在当下

千年岁月流转，昔日繁华的邺城如今隐没于田野村庄之下。遗址面积巨大、点位分散，文物保护面临重重挑战。

“临漳县构建县、乡、村三级网格化保护格局，覆盖遗址所在的郚城镇、习文镇共计16个村庄，配备30名基层网格员，都是当地村民。”临漳县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赵泽森说。

针对不同类型的遗迹，保护团队采取科学分类保护手段：宫殿、城门夯土基址，实施围栏围挡、防风化加固；部分发掘后的遗址进行回填保护，隔绝风雨侵蚀；朱明门、广德门等重要遗迹，采用原址标识、地面模拟展示的方式，将埋于地下的城址轮廓直观呈现给参观者。

遗址公园里，一条条旅游步道串联起各个重要遗迹点，游客可以漫步田野之间，近距离品读夯土遗存背后的故事。

配套的公共文化设施持续完善。邺城博物馆完成改陈升级，引入数字技术和互动展项，让观众“穿越”到历史现场，感受邺城三台的宏伟，体验官渡之战的激烈，见证六朝古都的变迁。

当地依托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办学术研讨活动，邀请考古、历史专家汇聚临漳，深化邺城历史研究，推动考古成果转化成为大众可以读懂的文化内容。同时，搭建公众考古平台，开展考古研学、讲座等活动，让公众近距离感受考古的魅力。

近几年，临漳县打造邺城北朝文化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邺城博物馆、邺城考古博物馆为载体，开发出“设计我心中的邺城”“北朝建筑瓦当拓印”“发掘考古盲盒”等研学课程，吸引了大批北朝文化爱好者和学生前来研学。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夯土高台之上。昔日殿宇楼阁早已化为尘土，但是邺城所开创的都城规划、慷慨悲壮的建安风骨、多民族交融的文明记忆，并未随时间消散。

一代代考古人接续探索，一代代文保人悉心守护，让这座千年古都从沉睡中醒来，向今天的人们讲述波澜壮阔的历史。



▲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展厅。

本报记者 张文豪摄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5年。日前，仰韶时代与中华文明形成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州举办。近百名考古领域专家学者汇聚郑州，围绕仰韶时代考古新发现、区域文化互动、早期文明化进程等话题展开深度研讨，共同溯源中华文明形成过程。

仰韶时代是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仰韶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各个文化构成的时代，是中国各地社会逐步分化并最终出现早期国家、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时期。1921年10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在仰韶文化发现105年之际，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博物院联合主办本次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居中认为，仰韶时代是中华远古文明奠基的关键阶段，仰韶文化不仅遍布中原，而且其影响所及，北过长城、南过长江、东抵大海、西达甘青，上下两千年，纵横几千里。仰韶时代普遍流行的彩陶，不仅是一次影响甚广的艺术浪潮，更是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浪潮，对当时乃至其后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发掘资料的积累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表示，历经百年耕耘，中国考古学界在仰韶文化遗址的聚落形态揭露、文化谱系构建、绝对年代测定及生业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资料整理与出版、区域系统调查与聚落考古研究、多学科深度融合等方面，还需持续突破，应注重考古成果转化与遗产保护协同发展，让仰韶文化从学术殿堂走向大众，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力量。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顾万发提出，以清浄沟城址和双槐树遗址为核心的河洛古国，依托环嵩山优越的地理区位、规范化的都邑体系与多元复合生业模式，发展为仰韶时代中晚期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相较于同期各类史前古国，河洛古国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以河洛古国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古国群的崛起，标志着中华文明完成从“满天星斗”多元散立格局到以中原为核心的“重瓣花朵”格局的历史性转型。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表示，仰韶文化起源始终是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从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后提出“西来说”，到半坡、庙底沟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的两个类型，再到裴李岗、磁山、老官台等更早阶段遗存的相继发现，仰韶文化起源于本土已成为学术共识。仰韶文化“一元多支”的形成模式是中原史前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缩影——以裴李岗文化为内核，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文化因素，奠定了仰韶文化2000余年发展的基础。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5年，也是西阴村遗址考古发掘100周年，本次会议是一系列仰韶文化学术活动中的首场。”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近10年来，杨官寨、双槐树、城烟、王庄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屡出硕果，仰韶文化研究再度升温。当前，仰韶文化进入新一轮研究阶段，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值得重视，需要研究者持续努力。

研讨会期间，与会学者在两处仰韶文化遗址——郑州市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巩义双槐树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贵州黄平：开笔破蒙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新州镇中心小学为一年级新生举办“开笔礼”。通过开笔破蒙、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学写“人”字等传统礼仪，让新生树立求学志向，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图为一年级新生展示自己写的“人”字。梁文摄（人民视觉）

